

北京大学历史問題講座

第七講

关于尚鉞同志为“明清社会經濟
形态的研究”一書所写的序言

刘大年講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學歷史系專題講座

第七講

關於尚鉞同志為“明清社會經濟
形態的研究”一書所寫的序言

劉大年講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門內承恩寺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4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統一書號11010·41 開本850×1168¹/₃₂ 印張1⁸/₁₆ 字數17,000 印數0001—2,2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價(7) 0.08

关于尚鉞同志“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一書所写的序言

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年三月間出版的“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一書上有尚鉞同志写的一篇“序言”。作者在“序言”中認為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長期性、十九世紀中叶中国仍是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和鴉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等,这些在学术界已成定論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明白否定了这些看法。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因为它直接涉及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基本問題的論断、涉及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些重要問題。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討論,以求得認識的一致。

中国历史有許多特点。这些特点經過科学的考察、研究以后,表現得極為显著。

無數的文物和史籍証明,中国历史上有很長的封建社会时期。至少自秦汉至十九世紀中期的社会生产中,人們对于生产資料的占有关系,主要是地主占有土地,剝削压迫农民。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矛盾是农民和地主在土地所有权上的矛盾。十九世紀外国資本主义侵入后,旧的社会經濟發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地主占有土地和集中土地的情况並沒有改变。近年来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材料足以充分証明这一点。据 1952 年的資料,約有三万万本来無地和少地的农民,經過土地改革,分得了約七万万亩土地,获得經濟利益的农民約占农業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長期以来,詩人所描写的社会生产中的“男耕女織”,即小农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一直是中国封建經濟的突出特点。1840 年中英鴉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一个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地改

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內容，是外国資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从經濟基础到上層建筑，各方面占有控制地位。虽然外国資本主义是一种外部力量，但是它侵入中国內部以后成了阻碍中国社会發展的一种最惡毒的势力。这种势力只是在鴉片战争以后才形成的。鴉片战争以前，中国和西方資本主义国家有通商交往，也有过早期的冲突，但是那时外国决沒有在中国建立起这种半殖民地的控制。鴉片战争固然不像一把快刀，將中国历史这束乱麻一刀斬为兩断，但是也决不能抹煞这以前和以后的根本区别。这就是我們把鴉片战争看做中国近代历史起点的根本原因。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指的从鴉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历史。

自馬克思本人起，包括毛澤东同志在內的經典作家們根据上述事实，对中国历史作了許多重要的、科学的論断。在这些論断中有：（一）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經歷的时间很長，在封建制度下社会發展很迟緩，甚至呈現某种停滯的状态。馬克思在“貿易还是鴉片”、“中国事件”等專門論述中国問題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不管时事如何变迁，却仍停滯不前；在“資本論”中叙述“分工与手工业制造業”时，也表示出同样的意思。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論”等著作中，更一再說到中国封建制度延續的时间很長，陷在發展滞緩的状态中。（二）小农業和家庭手工业結合的自然經濟是中国封建社会經濟結構的特点，直到鴉片战争以后的一个时期里，这种社会經濟結構仍在發生某些作用。1858年、1859年馬克思写的“貿易与条約”、“对华貿易”等專論中，指出“当前”的中国社会經濟結構是小农業与家庭手工业相結合。1858年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和“資本論”上“关于商人資本的史的考察”中有同样的叙述。1892年恩格斯“給达尼爱松的信”、1894年給“佐尔的信”也都連續講到中国小农經濟的这个特点。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然經

济,是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三) 1840 年中英鴉片战争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起点。馬克思几次講到太平天国革命时,都認為它是鴉片战争的产物,在“中国事件”中着重指出,对于这个国家,“鴉片不曾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惊醒的作用,这是很矛盾的”。全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凡是論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地方,有的是直接指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是从鴉片战争开始的,有的則是以此为背景来叙述事件的發展。这些馬克思主义的著名观点,差不多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所熟知。

当然,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也諄諄告誡人們,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更具体的指出:“我們的历史見解主要是研究的响导,而不是黑格尔学派式的構造的杠杆。”^① 我們坚持运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不是說人們研究問題可以不从客觀事实出發,而去从理論、从个別的結論出發; 我們是說要拿馬克思主义作为响导,进行創造性的研究。那种随便列举几条材料、生按硬套馬克思主义公式或者食古不化、不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做法,都是和馬克思主义的研究背道而馳的。上述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們对中国历史的論断,却不是只涉及个别具体問題的个别詞句,而是馬克思主义解釋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这些观点,第一,不仅如上文叙述过的,它是以大量的材料、最基本的事实为基础的,有充分根据。还有第二,有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質、階級矛盾和革命力量等一系列的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正是依据这些历史观点来分析、認識和确定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实践,檢驗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証明了它們合乎历史發展的实际。

因此我們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應該以这些观点作为指針,来深入研究,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离开这些观

① “給斯密特的信”。

点，就必然要違反历史的客观存在，并使許多中国革命实践已經解决了的問題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以致錯誤百出。尙鉞同志为了树立起他自己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見解，拒絕以这些观点作为研究的指針，直接了当推翻了这些观点。他在“序言”中写道：“关于明清兩代社会性質的討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問題。这个問題的解决，不仅將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傳統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長期性或中国社会停滯論，乃至中国社会一直到 1840 年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等等，而且也將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問題。因为，不拘从社会經濟的發展上，或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态發展綫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繼續和發展上，以 1840 年外国資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綫，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斬断历史發展綫索的毛病。”这段話是很清楚的說明兩件事：一，这里的所謂“史学界”的“某些傳統看法”，完全不是別的，正是前面举出的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根本論断，是从馬克思本人起的經典作家們多次申述过的論断。二，这些論断無論是从基础和上層建筑来查考，都証明其不正确，是斬断了历史的發展，不能成立。馬克思主义指出的中国封建制度的長期性，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和从鴉片战争起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几点是互有关联的。尙鉞同志所要树立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奇異見解，是要極力夸張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生产中的資本主义关系或資本主义萌芽，把中国資本主义的历史大大提前，改变明清之际的社会性質。为了这个目的，就不仅要否定鴉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必須一并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長期性和在明清以后，特别是在鴉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存在着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这个特点。

这里要指出：当尙鉞同志明白否定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

的根本观点时，是和他表示在进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我們指出他推翻了馬克思主义观点，却不是認為资本主义萌芽問題不需要或不可以研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研究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在鴉片战争以前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产生了哪些作用等等，是个很有意义的題目。商品生产在中国出現很早。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商品經濟有了發展。毛澤东同志說：“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这是完全正确的。研究这个問題，至少有下列意义：（一）有助于用中国的实际材料，具体闡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發展观点，說明封建制度必然發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規律。目前我国抱有資產階級观点的历史研究者，仍在用各种方法歪曲历史發展的規律，为资本主义制度招魂。譬如雷海宗之流，否認五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二）可以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全貌和特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規律，表現在不同的国度里会各有特色，中国社会經濟生活中的特点尤其显著。（三）直接駁斥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散播的所謂中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开发”，社会就要永远停滯下去等关于中国历史發展的謬論。1953年“紅樓夢”的討論中強調这个問題以来，报刊上發表了不少有关的論著。虽然在解釋史料、判断萌芽大小、時間早晚等方面分歧很大，而收集材料、进行初步研究，却有其成績。如果講到缺点，我以为主要的是我們有些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人，把古代历史加以現代化了。所有这些作者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资本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因素混淆在一起，并把現代资本主义的諸范畴和特征搬用到在封建主义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同

① “毛澤东选集”，696頁。

时从現有的論著中还可以看出，許多研究者的目的不明。他們只是这样那样証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內部有資本主义关系，而不是着重研究这种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有何特点等等。証明封建社会內部有資本主义关系，显然只是研究的开始，不是研究的最終目的。这些缺点要在研究中注意克服，也是可以克服的。

尙鉞同志在“序言”中提出的問題，根本不是这些。他的研究对象本来是封建社会內部的資本主义萌芽，而他所作的結論則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性質。因此，“序言”上一面推翻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張，并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了一系列的新奇解釋，直接牽涉到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些重要問題。

讓我們先看看“序言”作者否定了鴉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起点以后，他自己的关于近代史起点的答案是怎样的吧！尽管猛然看起来这个答案有点含糊其詞，并且自相矛盾，但是在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論述过之后，他的基本主張仍然是很明确的。

一种回答，是明末清初开始了中国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时代。作者写道：“太平天国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天朝田亩制度，平等和平均观念的發揮，以及政治和軍事組織及其內容，如果不与明清之际的市民斗争及其参加农民斗争的現象联系起来，特別是不把它作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政策的一个發展来看，就無法解决。同时如果不把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想，作为从明末清初經濟思想上的均田、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平等平均的观念（由地主与农民平等、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儒釋道封建宗教的束縛）等等反封建特权及反封建大地产斗争在意識形态上的反映的繼續和發展，并將它在人民大众的革命綱領和實踐行动中具体化，也是無法理解的。”再写道：“實質上太平天国所提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与产生于明

清之际一直到太平天国时始終不停、繼續發展着的社会矛盾之上的新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論，乃至社会問題，如市民运动，特别是其中的資产者与無产者的斗争，在苏州开始以阶级的集团的形式出現，以及民主的和民族的思想的發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两段話的要点是：（一）明清之际的时代，基本上就是鴉片战争以后的时代，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矛盾是“产生于明清之际一直到太平天国时始終不停”地發展着。（二）鴉片战争以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实际上就是明末农民革命运动。它們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序言”作者既否定了鴉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起点，又从社会經濟、革命运动、上層建筑等方面把明末清初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国直接联系起来，他是主張明末清初的时代，就是中国資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这是很明显的。再一种回答，明末清初是資本主义占优势的封建社会。“序言”上写着：“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显然还未达到質变的程度，所以仍然是封建社会。”“我們肯定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内部，也有它發展不同的阶段。”同时，那上面又写着，中国的資本主义萌芽在“十六世紀前期开始”，“到十六世紀中叶以后，漸漸發展成比較有力的社会势力”。（在“中国資本主义关系發生及其演变的初步研究”上，作者又說：“特别是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国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質的变化。”明末三五十年是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比“十六世紀前期”晚几十年。）“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基本上还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但是由于商品經濟有了某些發展，在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区，如苏、松、杭的三角地区等城市手工業中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义萌芽。”再又写着：“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經是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社会，不再是什么自然經濟整体的‘完整的封建社会’，或‘原封未动的封建社会’。就是說，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經逐漸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發展的严重阻碍，封建制度已經愈益成

为要被推翻的东西了。……这就是在 1840 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引起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到 1851 年太平天国运动展开的反封建的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变的关键。”这是明白地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十六世纪以前，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向前发展，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优势，中国从此再也不是什么“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封建社会了。因此，明清之际的这种变化，就成了后来历史事变的决定关键——主要是“反封建的、民主的”革命运动的关键。

稍微分析一下这两种说法，就立刻可以看出还有第三种回答：明末清初由封建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回答从作者的思想逻辑上表现得很清楚。要是果真作者不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达到了质变的程度，那么“序言”上几乎用全部篇幅论述的下列各点就全都是无法解释的和是毫无的放矢。（一）一再肯定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是近代中国“历史事变的关键”；明末三五十年间“中国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质的变化”，又一再声明这种变化“未达到质变的程度”，无论如何这两个断语不是同义语，是针锋相对的意思。究竟以哪个为准呢？不会是都对又都不对吧！（二）指摘以鸦片战争作为一个标志划分历史时期的不当，则正是认为明清之际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从此划分历史才是适当的。这完全推翻了明清之际仍是封建社会的论点，声明显然是一句空话而已，并無真实的内容。（三）只有认为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相当于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化，才需要从社会经济、革命运动、思想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把明末清初和太平天国直接联系起来，虽然这种联系并無根据。要是果然认为明清的变化与后者不同，那时还是封建社会，这种直接联系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事体。（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指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个特点，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

封建社会逐渐改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丝毫不排除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它的前期和后期这个事实。这两者完全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唯有认为明清之际发生了从封建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有的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才需要根本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事情非常明显：或者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肯定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资本主义关系的發生；或者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从明清之际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二者必居其一。“序言”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是拒绝了前者，肯定了后者，这是很清楚的。举此四端，“序言”上声明承认明清之际仍是封建社会云云，其虛假而没有内容，该是何等明显！

这几种说法，尽管表面上有分歧，但是有一个根本之点，贯穿着所有这些说法。那就是主张明清之际开始了中国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明末清初是近代历史事变的关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而不是鸦片战争是近代历史事变的关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不管我们赞成还是反对这个主张，必须承认这就是尙铤同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后的正面主张。所以我說“序言”上的答案，乍看起来虽然有矛盾，实际上仍是很一致、很明确的。然而作者在叙述中又没有公然的，直接了当的宣布自己的結論。叙述中表现为吞吞吐吐，表现出一种欲語还羞，“脉脉此情誰訴”的神情。这不是别的，乃是充分暴露了作者的根据薄弱，邏輯上、論据上处处混乱，自相矛盾；并且对于所以要作某些声明的原意，正是欲盖弥彰！

“序言”上还写着：作者的意图很简单，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进行研究的。这表示作者认为自己的答案并不違反马克思主义，有理論“指示”作为根据。只須核对一下原文，就可以識破

这是似是而非的。毛澤东同志所說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着資本主义萌芽，沒有外国的影响，也將發展到資本主义社会这段話只有兩層意思。一是沒有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中国也是会走到資本主义社会去的；一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还只是資本主义萌芽。此外再沒有別的意思。在这段話里絕對找不出仿佛鴉片战争以前的某个时期里，中国已經有了資本主义制度这个意思，而可以成为断定明清之际开始了資本主义制度的根据。

無論从事实、从理論上講，既然尙鉞同志否定馬克思主义的觀點的主張都是站不住脚、不正确的，如是，他在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釋上，就必然要違反事实、牽强附会；或者說，他在下面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釋上，既然違反历史事实，就必定要得出否定馬克思主义觀點的結論。

这些問題中首先是近代中国历史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历史的問題。前面指出过，我們通常說的中国近代史是指的 1840 年以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历史。半封建半殖民地主要是外国資本主义在中国的控制。“序言”上主張明清之际就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但是誰也不会相信，从那时起，就有了外国資本主义控制中国这个事实。这样，作者就只能認為中国近代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历史；或是認為起先是資本主义，后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或者認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指本国資本主义的發展，不是指外国資本主义的控制。無論哪样解釋，总之和我們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第二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質問題。“序言”上写着“不拘从社会經濟的發展上，或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态發展綫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繼續和發展上，以 1840 年外国資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綫，都是不很妥当的。”又写着：不闡明 1840 年以前資本主义萌芽、發展、演进的过程，“就不可能了解 1840 年的鴉片战争中，东南沿海一帶中国人民自發的反侵略斗争之成为資产階級性的民主的和民族的旧民

主义革命开始的历史原因和物质基础”。这两段话里的“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之成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等，是一些恍兮忽兮、含糊混乱的概念。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矛盾，都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没有哪一种是中国社会“外部”的矛盾。鸦片战争则是有清政府在内的反侵略战争，不是只有“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参加的其他什么战争。并且有外国侵略就有反抗，不是要有资本主义萌芽才有反抗。这两段话的中心意思是：从明末清初起，直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封建势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和大家的认识又是根本不相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①又指出：“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成半殖民地。”^②要是照“序言”上的说法，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矛盾，即令不是若有若无，不关痛痒，也只是在近代历史的半路上加进去的。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只有次等的重要性。第三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我们说，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由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所以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他们的力量很软弱，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序言”上断定早在清朝初年已经有“资产者与无产者的斗争，在苏州开始以阶级的集团的形式出现”。毛泽东同志论及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604页。

② 同上书，790页。

在中国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些。”^① 这完全合乎历史的实际。“序言”作者在“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發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反駁道：“在雍正年間，至少在中国江南苏、松、杭三角地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已在形成中，而且随着两个階級的形成，也出現了这种新的階級矛盾和斗争。……如果認為近代無產階級只有在大机器工業出現之后才会出現，就未免切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發展的历史，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中國無產階級产生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的錯誤結論。……我們不能以‘有大机器就有無產階級；沒有大机器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形式主义公式，来簡單地概括中国社会的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发展历史。”^② 这除了肯定中国資本主义的發生、發展是在明清之际，是認為中國資產階級資格很老，不是那么軟弱無力。这是不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是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不是一开始就和外国資本主义有联系。第四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質問題。“序言”上不仅断定太平天国运动就是李自成运动的繼續，而且一再說它們的性質都是和所謂“市民斗争”、“市民运动”相联系的。虽然沒有直接肯定这种运动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运动，但是却从反面否定了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是不同时代的农民战争。从事实上和理論上都無法証明这一点。

諸如此類的問題和謬誤，都發生于一个根源：否定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提前和“創造”了中国資本主义的历史。“認清中国社会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基本問題的根据”。^③ 尙鉞同志对“国情”的認識与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絕然迥异，因此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的看法，也必定要和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分道揚濺，愈去愈远。其源不清，

① “毛澤东选集”，579頁。

② “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發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277—8頁。

③ “毛澤东选集”，603頁。

其流必濁，此乃理之所當然，勢之所必至啊！

翻开尚鉞同志的其他作品，我們可以知道，“序言”上的主張并不是孤立的。在作者本人看来这还很合乎邏輯。他早在“中国資本主义关系發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上充分發揮过这些論点，“序言”只是更加集中、更加明确起来了。在“資本主义关系研究”这本书里虽然没有公然宣布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基本論断是不适用的，而事实上却是全部推翻了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書上的論述不止涉及鴉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根本問題，也涉及这以前的許多重要問題，很值得仔細加以研究。我現在只从这本书上照頁碼順序摘录若干段，看和“序言”有什么联系。

六七頁：“不拘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上与形式上，我們都可以看見明代，特別是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質的变化。”八九頁：“所以在商品經濟統治的地区，如工商業城市附近，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特別是資本主义因素萌芽比較增長的苏、松、嘉、湖、杭一帶及东南沿海地区，由于自然經濟与中农的衰落，农民向兩極分化的程度很大，工役制就逐漸为資本主义制所排挤。”九一頁：“从这种經營方式上，我們可以看到这个經營地主，已在把农業生产上，不論是主業和副業的生产物，都在当做商品，更正确一点說，当做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生产，而不是当做自己的消費品来生产。在这里，我們明显地看見，資本主义制度及經營方式的存在。因为，这种現象，只有由封建生产方式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国家或社会才会有的現象。”一一五頁：“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就我們所涉及到史料說，在明代如果还是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到清中叶則已經遍及于各地；如果在明代还只限于絲織業、陶瓷業、煤矿和东南的商業性农業等等，到清代中叶，則差不多遍及于各行業、各地区。……因此，我們認為在农業上，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在工商業繁盛的地帶，基本上已是契約的关系，在矿業、紡織業、陶瓷業、制茶業等等，就其

結構來說，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經營。它們與巨大機器工業的區別，只在它們的技術不發展，工人的工資低得僅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但是它們是資本主義的經營，是沒有疑問的。”——一八頁：“到清代……由於大量的農民被排擠出農村流向城市，而城市工商業由於統治階級的剝削、限制不能發展，無力容納，因之就再度形成以農民反對封建特權及大地產（“序言”上也有“反封建特權及反封建大地產鬥爭……”的話）為主體的新的中國社會危機，即第二次中國封建社會大危機。”——一九頁：“從上述的僱傭上萬人、上千人、或數十百人的手工業工廠相當普遍存在說，從商業資本組織家庭手工業的普遍現象說，這些已經具有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事業，除了技術比較不發達的情況以外，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物質條件都具備着。不僅如此，而且就它們的規模和結構來說，如果沒有強大政治上的壓力和阻礙，轉化為巨大的機器工業的物質基礎是存在的。”——一四一——一四三頁：“所有這些現象都說明了中國社會，從經濟觀點看，已是資本主義的‘所謂原始積累’時期。……在這個場合，中國社會便不可避免地又走上了大革命的道路上。……明末和清代中葉，中國封建社會的兩次危機和大革命，不拘從形式和內容上看，都証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斷的正確。……在清代前期的生產事業中……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轉化的要求和鬥爭十分劇烈，但卻長期沒有完成這個轉化過程。這雖然由於生產事業內部，正確一點說，中國社會內部所保留的落後殘余的影響，但主要的却是清朝落後的統治助長着這些落後殘余影響作用的延長，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因之，中國的生產事業拖着濃厚的封建尾巴，走上世界歷史舞台時，已經在外國的資本主義高壓之下，無力抗衡了。”不必再抄錄下去，歸納一下是：一、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由封建社會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變化。二、至清代前期，中國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工業高度發展的国家。僱傭上萬人、上千人、數十百人的手工工場相當普遍存在。與後來擁有巨大

机器工业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只是技术条件上有差别。三、农业方面，经营地主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封建的租佃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地主集中土地和农民失掉土地的分化是农民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凡是农村中的反封建，都不是反封建，是反资本主义。四、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不是反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反封建特权及大地产。五、李自成运动是近代反封建特权及大地产的第一次大革命，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天理教起事，是这种性质的第二次大革命。六、明清之际，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又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七、清代前期，中国社会内部只剩下封建的落后残余影响。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生产事业只是拖着浓厚的封建尾巴！書上这许多论断，早已彻底、全部、干净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序言”中明确提出否定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不过是这些论断的必不可少的画龙点睛之笔。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经过尚铤同志的描绘，是一个工业相当发达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很强大的近代国家的历史。同一个时代里，即使在欧洲，也只有资本主义最先进的英国或者差堪媲美，这当然是一幅很壮丽的图景。但可惜这只是出于想像，而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研究最怕碰见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些致命的敌人。尚铤同志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许多新奇的论断，是和他的非常主观片面的理解历史事件，甚至任意歪曲历史的反科学态度与随手抓来一些表面现象作为根据或任意解释材料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在此不准备详细讨论这方面的問題，只举几个例子证明这一点。

曲解历史事件的例子：反鸦片战争是清政府组织的有广大人民参加的中国民族反侵略战争，为人所共知。鸦片战争是表明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把中国变